

“不要叫我院士，请叫我老师”

演讲 钱易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她是国学大师钱穆的女儿、“力学之父”钱伟长的堂妹、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60年传道授业，如今83岁高龄仍然躬耕于三尺讲台。她说：“不要叫我院士，请叫我老师。因为做老师是我真正喜欢的事情。”

不久前，著名环境工程专家、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钱易先生来到“人文清华讲坛”，为大家讲述了“一门六院士，半门皆教师”的钱家故事，并深情回忆了影响她人生的几位恩师。

我们一家都是教师

我很小的时候受到父母的影响，开始对教育工作有了兴趣。

我们一家都是教师，我父亲那边叔父、伯父是教师，我母亲这边姨妈、舅父也是教师。我有3个哥哥1个妹妹，我们5兄妹全部都是教师。而且，我们5个人的配偶，有4个半是教师。为什么会有半个教师呢？那半个就是我的老伴，我的老伴在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工作，虽然不是教育部门，但是他是研究院的博士生导师，所以我把他称为半个老师。

我父亲钱穆是一位教历史的老师，他的人生道路很曲折。他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曾经有过五世同堂的规模。但是我父亲12岁时，我的祖父去世了，而且家道中落，我父亲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辍学了。于是，他开始做小学教师，后来又做中学教师，因为他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兴趣浓厚，所以工作之余不断读书、写文章。他就是因为苏州一所中学教书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刘向歆父子年谱》，受到了学术界的注意，特别是顾颉刚先生非常欣赏我父亲的那篇文章，特意来到苏州找我父亲，还对他说道：“你不适合再在中学教书了，我推荐你到北京的燕京大学去教书。”这件事情对我的启发很大。一方面，我父亲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不懈学习，这值得我学习。另一方面，像顾颉刚先生这样的伯乐愿意帮助一个年轻人，帮助他找到自己的位置继续成长，这也让我看到了一个老师应该有的品质。

由于种种原因，从1948年到1980年，我父亲和我们分开了30多年。我童年记忆中印象很深的是，他的书房在走廊的尽头，他在家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书房里度过的，我母亲总要嘱咐我们，走路不要出声，不要干扰你爸爸写东西。我父亲给我的3个哥哥起名字，也很有寓意。第一个哥哥叫钱拙，“笨拙”的“拙”；第二个哥哥叫钱行，“行动”的“行”；第三个哥哥叫钱逊，“谦逊”的“逊”。这3个名字都不是那种很响亮很辉煌的名字，而都有鼓励孩子的含义。比如“拙”，就是提醒儿子勤能补拙，要勤奋。“行”，就是行胜于言，不能光靠讲话，要多行动。“逊”，就是要谦逊。从3个哥哥的名字中，我会体会到父亲对于下一辈的期望和教导。

我父亲1948年离开我们到广州去教书，后来1949年到香港办了新亚书院，主要是教授中国文化、历史。新亚书院办了很多年，1963年港英政府建议把新亚书院与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成香港的一个大学，我父亲非常赞成。他提了两个建议，一个是这个大学的名字叫香港中文大学，另一个建议是希望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都由中国人来担任。这两个建议让我深深体会到，虽然父亲离开了大陆，但是他心里爱国的情怀并没有消失，他是非常爱国的。

1981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院长金耀基教授安排我的堂兄钱伟长和我去香港见了我父亲一面，那我和父亲分开32年后第一次见面。钱伟长哥哥12岁丧父，他基本上是由我父亲带着长大的，所以他们有很多共同语言。钱伟长当初考清华大学考的是文科，大学入学考试时他的文科成绩比较好，物理不及格，英文水平也较差。“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下决心要读理工科，要走科技兴国的道路，他的举动感动了当时的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吴教授说我给你一年的时间试读，看你这一年的成绩决定你能不能转到理工科，结果钱伟长这一年的成绩非常好，后来他在力学等方面作出了很多成就。他对我父亲说了自己做的事，我父亲听了觉得很欣慰。

我与父亲第二次再见面，是在1988年。父亲上世纪60年代离开香港后定居台湾，当时得了重病。正好那时台湾开放大陆同胞赴台探亲，所以我就提交了申请，因机缘巧合成了大陆赴台探亲的第一人。那时父亲已年逾九十，双目失明11年，病重卧床2个月。我每晚陪在父亲身边，帮助老人洗澡、穿衣，利用这宝贵的机会为父亲尽孝心。父亲的病情很快好转，不仅恢复了写作，而且能接待客人了。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常有家人的学生来看他，我也了解了很多我父亲教育学生的故事，它们使我深刻体会到，父亲将一生献给国学和教育是多么有意义。

我的母亲张一曾曾经是苏州一所小学的校长，她白天在小学工作，晚上回来除了照顾我们5个孩子，还要准备学校里的工作。我家住在苏州的耦园，那是一个很大的苏州园林，当时有十几个人家都住在那个院子里。每天晚上吃完晚饭，邻居就会把他们的孩子送来，让我母亲给他们辅导功课，大约有七八个小孩，我母亲就在两张桌子间跑来跑去，一个一个地辅导。我当时还没上小学，但是我看得出来孩子们都很喜欢我的母亲，都听我母亲的话，所以我们都就感觉到做老师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老师是非常受人欢迎的。

另外一件事给我更深的印象。上世纪50年代，我已经十几岁了，那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有很多受伤的士兵回国治病养伤，有一些就住在耦园。我母亲见这些年轻的战士们天天只是休养身体，病得也不是太重，就关心地问他：“你们有没有兴趣学一点功课啊？”数学、语文、历史我都可以教你们，你们想学吗？”那



我们家有一个祖传的《钱氏家训》，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更谋之。”我自己一辈子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做教师，一件事是从事环保事业。我仔细想一想，这两件事都是利于天下，都是利在万世，都是有意义的事，所以我感到非常欣慰。

——钱易

些年轻的战士都说“我们想学”，于是我母亲每天抽出时间给他们上课。这些年轻的战士有的叫我母亲“老师”，有的叫我母亲“妈妈”。我当时看了这一幕，觉得做老师那么重要，那么被人需要、受人欢迎，所以从那时起，我心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我决定长大了要像我母亲一样，做一个老师。

我再讲一讲我姨妈的故事。我姨妈年轻时曾经有过一个男朋友，后来抗战的时候牺牲了，所以她一直没有结婚。她和我们家很亲近，又特别喜欢女孩子。所以，从我出生一直到结婚、有孩子，她总是很关心我和我的家，直到她去世。她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她有一种人生哲学叫作“三乐主义”，即知足常乐、自得其乐、助人为乐。虽然她自己的生命中有挫折，但是她总是很乐观，能够和周围的人交朋友，并且把乐观的心态传递给自己的学生。她的“三乐主义”对我的生有很大的指导作用，我也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总是乐于见到好人好事，万事从好处去想，而不去纠结于某些让自己伤心的事。

对我影响至深的三位恩师

在我的成长中，有很多老师对我帮助和影响非常大，我想说一下其中的三位老师。

我本科上的是上海同济大学，学给排水专业。有一位老师叫胡家骏，他总是在关键时刻指导我、点拨我，给我非常重要的影响。我大学毕业答辩后，答辩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的陶葆楷先生请胡先生鼓励我考他的研究生。胡先生来动员我，我直接就拒绝了，我说我不去清华，我要去兰州建设大西北。后来胡先生就对我说了几句话：“第一，陶先生是市政工程界全国第一的学者。第二，他要招研究生，你能考上的话，是你的幸运，你能学到很多东西。第三，很多人去考，你能不能考上还是问题。”于是，我改变了主意。后来，我考上了陶葆楷先生的研究生，来到了清华大学。所以，如果没有胡先生，我不可能成为清华的老师。

胡先生还有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上世纪90年代，我突然收到一封胡先生的来信，长长的有4页纸。胡先生在信里说：你最近工作生活好吗？听说你现在的有很多社会工作、社会活动，你还有没有时间做研究？他指的是我先当了政协委员，后来又当了人大代表。他说，我们这个行业需要人才，工作任务很重，你不要放弃你的专业，你一定要好好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我读了信非常感动，我和胡先生分隔那么多年，而且远在千里之外，他担心我没有把足够的精力用在业务上，居然写信提醒我、关照我。于是，我马上提笔给胡先生写回信，详细地告诉他作为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需要做什么工作，我说我曾经参加了环境保护方面有关法律的制定，参加了很多执法检查的工作，我还在会上经常就环保、教育问题提出建议，在教书的同时我也一直坚持做科研。我的信也写得很长，胡先生收到信后很快又给我回了信，他说：知道你做的事都是有意义的，我放心了。胡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恩师，他让我深深体会到做一个老师就要对学生负责，而不仅仅是讲课而已。

陶葆楷先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我初来清华时还有点紧张，但是第一次和陶先生见面，就让我完全放松了紧张的心情，觉得陶先生就像是一个亲人、一个家长。陶先生虽然对我非常亲切，但是他要求学生是很严格的。他让我一定要上两门课，一门是数学课，在清华上，一门是微生物学课，要到北京医科大学去上。医科大学的微生物学课，要用小动物做实验，比如要给小白鼠打针，然

后检测小白鼠发生的变化。可是我很怕小动物，不敢把小白鼠抓在手里，所以经常出洋相。

其实我后来做科研，很多项目都是和微生物处理技术相关的。我记得有两个项目都取得了成功，一个项目是“高浓度有机工业废水厌氧生物处理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另外一个项目是“难降解有机物的处理工艺和技术”，获得了自然科学进步二等奖。我到北京医科大学去上微生物学课所打下的基础，对这些工作都有很大帮助。

陶先生还有很多带教学生的方法，让我受益良多。比如当时北京市有一些关于给排水的问题，经常召开专家讨论会，陶先生总是把我也一起带过去。像北京市的污水处理厂应该设在什么地方，应该采用什么工艺，应该怎么做，这些问题非常实际，听了不同专家的讨论，就像是上了很多不同老师的课一样，收获很大。我研究生毕业后担任了陶先生的助手，第一个工作就是和他一起编一本书。其实这本书主要是由陶先生写的，我的工作就是做表格、收集数据、进行计算、画图等等，此外陶先生还让我写了两章内容。等到书出版的时候，陶先生居然把我的名字和他并列放在书的封面上，这让我非常惊讶。我对陶先生说我没有做什么事，怎么能够作为作者之一呢？陶先生马上说，你做的工作是少不了的，你就是一个作者，你以后也要自己独立做作者，写这样的书。所以，我在陶先生的手下做学生、做助手，得到了陶先生精心的培养和呵护。

还有一件事让我感激不尽。1980年学校选拔一些人出国做访问学者，第一次选拔的名单里没有我，后来陶先生发现了，马上上去给系领导提意见，他说钱易自学过英文，一定能考上。1981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去了美国，这给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我在国际上认识了不少专家，参加了很多活动。我后来经常想，在我的一生中，假如我没有遇见陶先生，我会是什么样？我肯定不会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我的人生道路肯定完全不同。

第三位我想说的老师是顾夏声教授，他和我从事的专业、从事的研究和教学完全一样，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顾先生年轻时因为车祸造成骨折，走路有点瘸。但是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顾先生完成了留美的学习，后来在清华大学任教。

有一次，我有一个专业上的问题不明白，去请教顾先生，顾先生说他考虑一下再回答我。那天晚上，突然有人敲我家的门，我开门一看居然是顾先生。我当时住在五楼，顾先生住在一楼，我说你怎么爬上五楼了，我的腿很不方便。他说没关系，我来跟你解释一下你提的那个问题。顾先生的治学精神、教育学生的精神对我的影响很大。

顾先生是无锡人，他讲的普通话里带着很重的无锡口音，学生往往听不太懂，所以顾先生练就了非常厉害的写板书的能力。他上课时一边讲一边写，可以让听课的学生完全听懂他的话。顾先生给研究生讲课的时候，他还想出一个办法，他说研究生要好好提高英语水平，我这门课干脆就用英语讲课吧。学生们听他用英语讲课比听他用无锡话讲课更容易懂，所以这门课不仅学了专业知识，还锻炼了英语听力。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钱家有一个祖传的《钱氏家训》，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更谋之。”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每个人做事一定要看它有利于什么，如果这件事只有利于一个人，那就不能做，有利于天下的人才去做；如果是有利于当前一时的事，你要去做，但是有利于千秋万代的事你更要去。我自己一辈子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做教师，一件事是从事环保事业。我仔细想一想，这两件事都是利于天下，都是利在万世，都是有意义的事，所以我感到非常欣慰。

演讲

我的排球人生

张萍

近日，前中国女排国家队队员张萍来到“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为大家讲述了她的跌宕起伏的排球生涯。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前中国女排国家队队员，曾经获得过2003年女排世界冠军和2004年雅典奥运会冠军。

我是一个普通家庭里长大的孩子，没有什么天赋异禀，可能唯一不同的是我有一位和电影《摔跤吧！爸爸》里一样的父亲。我的父亲把他的排球梦全部寄托在了我的身上，当时他的每月工资只有43元，他却毅然贷款7000多元，为我买了一台录像机，对我的打球动作进行录像，以分析我比赛时的表现。

小学时，我就加入了校排球队，但那时我对排球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只是愿意和小伙伴一起玩而已。到了中学，一开始我的身高不高，于是转而参加了田径队练习投掷项目。但到了初二，我的身高达到了1.85米，父亲便让我转学进入天津市体校继续学习排球。

因为我比同龄的孩子晚几年进入体校，所以只有加倍训练才能赶上她们。我刚学侧滚翻救球时，胯部和后背都磨破了，每天早上起床时伤口和被单都粘在一起，可我不敢告诉爸妈，憋着一股子劲继续练。

后来，经过层层选拔，我进入了天津女排。成年队的训练更加艰苦，第一天训练脚底就磨出了血泡。由于我的排球技术欠佳，当时很少有参加比赛的机会。于是，我的父亲就每晚带我加练，增加我的体能，提升我的排球技术。

1998年，排球技术改革，出现了自由人这个位置，自由人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后排一传和防守的质量，替换后排高个子运动员，达到平衡攻防的效果。因为这项改革，我开始有了上场的机会。但休假对我来说成了奢侈的事情，每年的排球联赛从冬天开始，到春天结束，几乎每一个春节我都是和队友、教练一起度过的。

慢慢地，我的实力得到了提升，被选入了国家青年队。我第一次穿着有国旗的运动服，代表国家参加国际大赛，心情无比激动。

2002年，我正式进入国家队。那时正备战女排世界杯，教练对我们的要求愈发严格。陈忠和教练经常说：“你们是我带过的身体条件最差的一届。”所以，除了每天高强度的8小时训练，还要加班加点地训练。记得有一次，我们没有达到陈指导的要求，练了3个小时以后才休息喝水。那时夏天没空调，汗都流干了，感觉自己就像是在沙漠里。教练也非常辛苦，练防守的时候，如果要求我们达到好球20个，他可能要扣40个球甚至更多，才能让我们完成一组。封闭训练的时候我们一共20人左右，训练结束后教练还要看录像，做技术分析，再根据队员的具体表现制定第二天的训练任务。

同时，陈指导十分注重培养我们的意志品质和团队精神。在湖南郴州集训时，训练基地附近有座山叫苏仙岭，有500多米高，一共有1760个台阶。陈指导要求全队在25分钟之内到达山顶，如果超时，全队就要重新爬一遍。我们每天都在挑战体能极限，摔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轻伤不下火线。我也从中渐渐感受到了女排精神到底是什么。

通过自己的努力，我终于以替补的身份参加了2003年女排世界杯的比赛，我们最终获得了阔别17年的世界冠军。我站在领奖台上，看着国旗徐徐升起，心里暗暗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参加奥运会。

2004年的冬训，距离奥运会还有不到5个月的时间，赵蕊蕊在训练时小腿骨折，由替补变为主力。为了真正成为主力，我每天课后加练，拦网、扣球，和二传配合技战术，每一个球都力求做到精益求精。因为国际比赛经验为零的我，不能拖全队的后腿啊。

奥运会的首场比赛，我们的对手是美国队。我并不是首发上场，因为赵蕊蕊又归队了。但没想到，几分钟后蕊蕊再次受伤，我被换上了场。当时我旧伤复发，每次比赛前要吃止痛片，打封闭针，缠上绷带，从小腿缠到大腿，好让我感觉不到骨头磨骨头的疼痛感。最终，我们进决赛了，决赛的对手是俄罗斯队。在0:2落后的情况下，我们全队齐心协力，拼每一分、每一局。终于，我们获得了1984年之后的第二个奥运冠军，我在那场比赛中独得25分，成为“最佳攻手”。

本来我心想参加北京奥运会，但2007年5月，我的膝盖不得不动了手术。我的运动生涯就此结束了。

做完手术的那天深夜，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哭。然而，哭也没用，已经这样了，排球教会我要认真拼好下一个球！于是，还在病床上的我开始学习英语。2009年，我赴香港中文大学求学，并最终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

现在，我成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一位老师。我很高兴还在做着与排球相关的事情，除了教给学生排球技术，我也希望学生能学习和感受女排精神，希望我的经历能带给他们更多的力量和勇气。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内容有删减)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曾经28载隐姓埋名，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研制突破作出卓越贡献。他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崇高荣誉后，一如既往地低调，盛名之下始终保持一颗初心，他曾经这样说道。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十亿高寒穷……神州神经飞腾日，家祭毋忘告乃翁。我想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特别欣赏这首诗。”

——近日，由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主办、清华大学承办的“2019年度求是奖颁奖典礼”在清华大学举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教授被授予“求是终身成就奖”，他在颁奖典礼上念起了著名爱国实业家查济民先生的诗歌《借放翁句告儿孙》，嘱托青年后辈要重视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变化是非常惊人的，仅基础设施而言，就与过去是天壤之别。很多人都在想，这个能持续下去吗？而事实上，自从我第一次访问后，这种进步一直在持续。今天，无论是在人工智能还是办公软件领域，中国工程师的人数一直在增加，队伍在壮大。我喜欢去中国，看看那里出现的新事物，因为在很多最新的创新都是由中国首创的。”

——近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老一辈电影演员接到戏，往往先要体验生活3个月至5个月；可现在有些年轻演员前脚迈出上一个剧组，后脚就奔下一个去了。要改变这种现状，只能靠演员自觉，演员要有更高尚的职业精神，尊重行业的基本规律，吃完一碗饭再吃下一碗。严于律己，这是一种对观众的负责。”

——不久前，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陈道明在人民网“文艺星开讲”节目中，这样谈自己对演员这个职业的敬畏和初心。



“如果追溯西方经典，会发现它拥有古典主义的崇高，深深感动读者，而现代主义则以复杂性使读者沉迷。当代中国文学在接受现代主义时，更多的是形式上的模仿，是沉迷，而缺少古典主义所仍然具有的感动的元素。我以为，中国传统这个河流不能中断，随便从中舀出一勺来，仍能品尝出古典的崇高与震撼。”

——不久前，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炜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谈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传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